

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

抗日扬名台儿庄 援朝全歼坦克营

□ 郑学富



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三次战役中,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与英军第29旅狭路相逢,三个步兵连以轻武器一举全歼英军“皇家重坦克营”。第50军的前身中国国民革命军第60军,在1938年春天的台儿庄战役中,因重创日军精锐而扬名。

二战时期东西战场上的两支劲旅

全国抗战爆发后,云南省于1937年10月在滇军的基础上,组建了由卢汉任军长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60军,出滇抗战。该军武器装备全部由法国进口,是当时中国军队中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。1938年4月,60军出滇抗战打的第一仗就是著名的台儿庄战役。他们在台儿庄东南的禹王山一带构筑阵地,阻击日军,浴血奋战27天,重创日军第5、第10两个精锐师团,掩护中国军队主力战略转移,打出了军威士气。后来又先后参加武汉会战、南昌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,抗战胜利后,开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。1948年10月,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在长春起义,回到人民的怀抱,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。50军三个师的师长等许多将领都参加过台儿庄战役。曾泽生在台儿庄战役期间任第60军184师1085团团长。

英军第29旅曾在英国名将蒙哥马利的统帅之下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,在北非参加过阿拉曼战役,与有“沙漠之狐”和“帝国之鹰”之称的德国名将隆美尔交手,在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中打出声威。尤其是所辖的“皇家重坦克营”,装备有最先进的“百人队长”式坦克,装配一〇五榴弹炮,以先进的武器装备成为英国陆军的骄傲。

截断英军“皇家重坦克营”的退路

1950年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,由5.8万人精简整编至3.3万余人,回师湖北修筑汉江大堤和参加农业生产。9月下旬,第50军接到命令,紧急收拢分散在湖北等地执行农业、水利生产和剿匪等任务的部队,乘火车紧急北上,拨归新成立的东北边防军建制。10月25至26日,第50军全部渡过鸭绿江,参加抗美援朝战争。

1950年12月31日,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,为打破美国政府“先停火,后谈判”,争取喘息时间,卷土重来的阴谋,突破“三八线”,对美国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及其指挥的南朝鲜军发起进攻,打响了第三次战役。至1951年1月2日,南朝鲜军扼守的第一道防线全面崩溃,汉城正面吃紧,美、英军东部翼侧完全暴露。“联合国军”司令官李奇微为避免十几万部队拥挤在汉江北岸背水作战,便下令全线撤退,只以小部队在汉城以北高阳、道峰山、水落山一线进行掩护,企图阻止中朝人民军队继续进攻。1月3日,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中转入追击作战。

美军为了自己逃命,特令英军第29旅皇家奥斯特来复枪团及英“皇家重坦克营”,在议政府地区担任掩护。志愿军第50军149师奉命向高阳、汉城方向追击。高阳地理位置重要,位于议政府至汉城的公路上。若占据高阳,既可以

俯汉城侧背,又能切断议政府英军的退路。在高阳以北1公里处碧蹄里驻守着美军第25师34团一个营的兵力。志愿军149师445团和446团各一个加强营组成先头追击分队,直插高阳。首先击溃在碧蹄里一个营的美军,俘美军28人,余部窜回汉城。志愿军乘胜进军占领高阳,随即向高阳东南仙游里进攻。

仙游里位于议政府至汉城公路以西,英第29旅在此阻击志愿军。1951年1月3日拂晓,志愿军149师以两个连的兵力,展开攻击,仅经半小时战斗,就占领195.3高地,堵住了英军皇家奥斯特来复枪57团第1营和“皇家重坦克营”的退路,将位于佛弥地的英军重坦克营与英步兵第29旅主力分割开了,使其成为一支孤军。149师446团2营在营长杨树云的带领下,完成了对“皇家重坦克营”的包围。

三个步兵连激战重坦克营

打坦克,对于50军的将士们来说曾有过惨烈的场面。早在抗战时期的台儿庄战役期间,当时60军的先头部队542旅1081团2营在行进中与日军遭遇,这是60军第一次与日军面对面作战,对坦克这个“庞然大物”更是第一次见到。于是战士们先是用机枪扫射,却连皮毛都没能伤到,有的战士甩出了手榴弹,在爆炸后,坦克仍然“轰隆隆”地往前压了过来,60军官兵们成片成片地倒了下去。营长尹国华带领战士们成班成排地端着步枪冲了上去,把手榴弹绑成几捆,等坦克开到面前时,他们就将这集束手榴弹塞进坦克底下,有的人干脆抱着手榴弹滚到坦克车下,与这钢铁怪物同归于尽。一声巨响之后,几辆坦克被炸毁了。这一仗,尹国华以下全营500名官兵除一人生还外,其余全部壮烈殉国。

149师没有打坦克的武器,只有靠炸药包、爆破筒与英军“皇家重坦克营”激战。战士们先用机枪、冲锋枪、步枪的火力,把伏在坦克上的步兵赶下来,然后,爆破组以炸药包、爆破筒、手榴弹炸坦克,先炸毁其先头坦克,再将其队形拦腰斩断,趁其混乱之际,以单兵、小组进行攻击。第3连9班班长王长贵是云南盐兴人,是一名老战士,因功勋卓著,于1950年9月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,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。在战斗中,王长贵带领战友们一起炸毁坦克5辆,并缴获一挺轻机枪。

最难打的是英军装有火焰喷射器的装甲车,志愿军形象地称为“喷火坦克”。第5连机枪班副班长李光禄是四川省三台县人,被拉壮丁加入国民党部队,在鄂川战役中加入解放军。为了加快爆破筒的爆炸速度,李光禄将爆破筒的导火索截短到了3公分长,这就要求李光禄必须在3秒内完成点火、投送、并撤退到安全地带等一系列动作。姜廷玉主编的《解读抗美援朝战争》中写道:“5连机枪班副班长李光禄,机智勇敢,只身冲入坦克群。将爆破筒塞到坦克履带中间,炸毁1辆坦克,尔后,又炸毁2辆坦克。”李光禄用爆破筒连续炸毁敌军重型“喷火坦克”3辆,荣立特等功。

第4连也在另外的方向上把“皇家重坦克

营”给堵住了。第4连战士顾洪运炸毁2辆坦克后,爆破筒用完,他爬上第3辆坦克,掀开炮塔仓盖,高举手榴弹,迫使投降。同时,由于顾洪运炸毁的坦克堵住了英军坦克的去路,其余坦克均被缴获或击毁。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三个步兵连,歼灭了英国一个重坦克营,毙伤俘英军300余人,缴获、击毁坦克31辆、装甲车1辆、牵引车及汽车24辆。步兵连用炸药、爆破筒、步枪、机枪和手榴弹打败装有一〇五榴弹炮的重坦克。

步兵连打重坦克创造战争史奇迹

50军的三个步兵连全歼英军“皇家重坦克营”的捷报传来,军长曾泽生兴高采烈,无不自豪地说:“我早就说过,我的部队是能打的!”战斗结束的当天后半夜,作战部队将200余名俘虏押送到师政治部敌工组,在当地找到一处朝鲜老百姓人家的院子,将这些俘虏带进去集中看管。当时仅有高中学历的敌工组副组长莫若健和南开毕业的孙崇山,捧着《英汉词典》突击审讯战俘,将这支部队命名为“皇家重坦克营”。经《人民日报》报道后,迅速在神州大地传播,人们在引用这一名称时规范地加上引号。

中国人民志愿军外停管理处第1团2中队教育中队长苏峥嵘曾回忆说,英军少校营长柯尼斯进了战俘营后,仍然死要面子不服气:“是你们使用了反坦克炮,打坏了我们的坦克,我才被你们俘虏的。”苏峥嵘耐心地告诉柯尼斯:“参加那天晚上战斗的我志愿军部队,根本没有配备反坦克炮,我们炸毁你们坦克的武器是爆破筒、炸药包和手榴弹!”这话,对绅士般的柯尼斯来说,无疑是个晴天霹雳、奇耻大辱,他几乎跳了起来:“你是吹牛!用手榴弹、爆破筒、炸药包,能炸毁我们的重型坦克吗?在我们英国的军事教科书上,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!”

面对铁的事实,英军哀叹:我们被美军出卖了,成了他们的替死鬼。从此,英军战史将葬送“皇家重坦克营”的这道谷地称为“死谷”。步兵连打重坦克,不仅敌人不相信,就连志愿军首长都认为是吹牛。当战绩报到志愿军司令部后,甚至“惹”得“彭总发火了”。后来50军将战报连同随军摄影干事拍摄的现场照片一起报送到志司,彭老总等首长们看后大为兴奋。1951年1月11日,彭德怀、邓华、洪学智、韩先楚联名致电各军并上报军委,表扬149师446团:“我50军149师446团在新年攻势中,由于全体指战员迅速积极行动,于高阳附近抓住英29旅及美军一部,给予沉重打击……此种果敢战斗行动,值得全军学习,特通令表扬。”

1951年1月4日,第50军149师攻入汉城。在第四次战役中,50军在汉江两岸顽强抗敌50昼夜,沉重打击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,为我军准备和实施战役反击争取了时间。一天,曾泽生在志愿军总部见到彭德怀司令员时,彭总紧紧握住他的手说:“50军打得好,你指挥得好啊。”1951年4月,50军回国休整,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曾泽生,鼓励他说:“你们在朝鲜战场打得还是蛮漂亮的嘛。”

二、特殊的借条

对于当时家庭富裕的杨长银来说,400块大洋对于一支军队来说不算什么,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钱财,此时他主动送给红军,就没有打算要回来。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猖狂,这支革命的年轻军队也是前途未卜,但他一想,就算以后兑现不了,帮助这支对人民秋毫无犯的军队心里也乐意。因此,从那天起,那张特殊的欠条就被杨长银当作了一份历史纪念,认真地保存了起来,但在他有生之年,从没有去和红军要账的想法。

红一军团离开湖北孝感挥师南下后参加了多次反“围剿”战役。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,红军先后赢得了前四次反“围剿”战役的胜利,但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时,由于王明“左”倾教条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,拒不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建议,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,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,经过一年苦战,终未取得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。1934年10月,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,突围转移,被迫放弃苏区,踏上了漫漫的长征之路。

这样一来,红军和杨长银的联系便自然中断了。直到解放战争时期,解放军势如破竹地解放了全中国,杨长银才再度见到了这支人民军队。可是杨长银却没有去兑现,一直将那张借条封在一个小盒子里。后来杨长银年事已高,在他去世前,又把这张“400块大洋红军借条”传给他儿子来继承,其子也把“借条”视作自家曾为中国革命出力的光荣象征。而随着时代的滚滚向前,杨长银的儿子也逐渐年纪渐老,并在临终前也拿出了这份保存完好的“红色借条”,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杨明荣要认真妥善保管。这张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艰难岁月最终走向辉煌胜利的“红色借条”,就这样在祖孙三代人手中一直传承了下来。

而杨明荣也打心里十分珍视这张“红色借条”,为了不让这张历经中国革命岁月的借条损毁,他还特意用防水漆刷过小盒子存放,平时也绝不打开。然而,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,这张借条终于面世。

三、历史不会忘记

“当年红军欠下了我家400块大洋,不知你们还给不给?”2015年的一天,一位老人来到了湖北孝感的民政部门,他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,字迹模糊,有许多字体也已经识别不清了,但依稀看到借条俩字。这人便是杨明荣。杨明荣是面临窘境不得已才找政府的。新中国成立后,杨明荣一直将父亲的嘱咐放在心上,即使田里收成差时,每天清水煮野菜时,他也从没有想过要兑现欠条上的四百块大洋。但此时他的妻子因生病急需治疗,在无可奈何之下,他忽然想到了那张跨越近90年之久的“红色借条”。按照借条所写,自己祖父曾借给了当年的红军400块大洋,如果能兑现,也许这笔钱能用来帮家庭渡过暂时的难关。

当地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头一回遇见,在问清了这张借条的来龙去脉后,发现这张借条的成色和杨明荣的叙述都能吻合,当即将借条送到了有关文史专家那里进行了核实和鉴定,最终文史专家认定杨明荣手里的借条,当时应该是红一军团部队1930年所借。

按照文史专家的意见,湖北孝感政府部门随即向杨明荣支付了4万元人民币的“红色借条”,让这笔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借条有了着落。这张借条不仅饱含着时代的红色记忆,同时也体现了当年军民团结的奋斗精神,更值得感慨的是当年开明地主杨长银的奉献精神,他在当年敢将这400块大洋义无反顾的捐献,这钱放在当年也算得上一笔巨款。对于杨长银来说,因为红军是“为受苦人打天下”的队伍,是值得信赖和支持的军队。

□ 汪志

三代人传承的红军「四百块大洋借条」



文明曙光五千年,河陇丝路三千里。甘肃文化博大精深绚丽多彩,其中有两个关键字“河”与“陇”。按照地域文化研究的习惯,甘肃文化体系应该被称作“河陇文化。”

“河陇”一词是今天甘肃省地域的历史文化称呼。早在东汉甘肃就有“河陇”之称,即是今天甘肃境内“河西”与“陇右”两个地区的合称。《后汉书·隗嚣传》载:“数年之闲,冀汉复存,当挈河陇奉旧都归本朝。”魏晋时期的记载见《宋书·夷蛮传》:“晋氏南移,河陇复隔,戎夷梗路,外域天断。”到了唐玄宗时期设天下为14个道,今天的甘肃地区有河西道与陇右道,《新唐书·吐蕃传》载:“赞唐代之,为东面节度使,专河陇。”到这时把“河西”与“陇右”统称“河陇”是在国家行政体制层面的确认。因为古丝绸之路的兴盛,把陇右与河西从经济、政治和军事上连为一片,河陇文化是从“河西”和“陇右”两个地区发生与发展,以后又融为一体。

甘肃的上古文化发源于陇右地区,而汉唐以来的甘肃文化兴盛于河西地区,从时间顺序上说是“陇”在“河”先。这两个文化形态的发展各自具有独立性,而河西文化与陇右文化最终融为一体,是以两个文化区交接处的金城兰州为枢纽节点的。

河陇文化中无论是“陇”还是“河”都具有非同一般的辉煌成就和重大意义。因为“陇”在“河”先,我们先说“陇”字。它的缘起是横贯陕甘宁三省区的“陇山”,也就是今天所说的“六盘山脉”。它既是关中原的天然屏障,又是大西北重要的分水岭,黄河支流泾河、清水河、葫芦河的发源地。历史上人们翻过陇山,或者叫“陇坂”就到了甘肃地界,那时候叫做“陇右”,泛指今天的庆阳、平凉、天水、定西以及陇南的东北部。

8000年前黄河一级支流渭河、泾河流域,也即是“陇”域的秦安大地湾先民们,已经走出了村落式的群居方式,有了较高层次的农渔业生产活动、成规模的彩陶生产作坊,能够建造连片式家庭居所和有防御堑壕的初始城邦,有了开展祭祀、部落会议活动的殿堂,



漫谈“河陇文化”

□ 王立仁

其中有人称“最早水泥”(秦安大地湾遗址遗存)的坚硬平整且十分光洁的地面,上面有舞蹈人形的绘画,彩陶器皿上刻划着最初文字雏形的符号。崛起于大地湾的人文始祖伏羲始作八卦、书契以代结绳记事;始作网罟,以渔、以猎;服牛乘马、冶金成器;制嫁娶,以媵皮为礼;造甲历、命五官,正君臣、夫妇、父子之义,经天纬地,功盖盖世,全面肇启了中华文明之光。

充满进取精神的伏羲部落,沿着渭水河向东迁徙拓展生存空间,最终发展成统合华夏的中原黄、炎二帝部落。今庆阳地区的周人先祖挺进关中,后来打败殷商建立800年的商朝。公元前763年,秦文公率700名勇士从西垂(今礼县)出发东征,在今陕西省宝鸡一带建立新的秦国都邑,后来兴起于关中,扫平六合创建大一统中华帝国,促进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体系的形成。由此可见陇右在中国历史文化

中的崇高地位。而伏羲文化在今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内蒙古等地的传播,造就了世界彩陶文化的巅峰——马家窑文化。通说甘肃文化是华夏文化的重要源头,这个源头就在陇右。

再说“河”字。自汉武帝元狩二年(前121年)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打败匈奴据有河西走廊,古代的河西西划范围内除了今天的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,还有那时候叫“金城”的兰州。《晋书·地理志》载:“汉置张掖、酒泉、敦煌、武威郡,其后又置金城郡,谓河西五郡。”这时候“河”就有了“河陇”的含义。到了魏晋十六国时期,河西地区相对安定,经济文化都得到巨大发展,产生了以敦煌莫高窟、学术大师周生烈、草书圣手张芝、张昶、索靖为象征,影响深远的“五凉文化”。“五凉文化”的核心部分是甘肃最具国际影响的敦煌文化,它留下了秦汉至宋元时期中华文化发展的

主要成果,见证了古丝绸之路承载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光辉历史。2019年8月19日,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敦煌时赞誉道:“敦煌文化集建筑艺术、彩塑艺术、壁画艺术、佛教文化于一身,历史底蕴雄厚,文化内涵博大精深,艺术形象美轮美奂,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”“五凉文化”保存了中原文化的火种,隋唐以后又把它回馈到中原,使得中华文脉得以赓续绵延不绝。如今敦煌学在国际上是一门显学,也是2500万陇原儿女坚定高度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。

“河”与“陇”连接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,肇始于霍去病西征,生长于河西五郡的设置,成型于丝绸之路大通道的兴盛。因为大西北屏障中原、维护国家战略安定的重要地位,加之丝绸之路的日益繁荣,今天的甘肃省省会金城兰州地位的不断上升,吸附力与聚合力的不断增强,使得陇右与河西更在经济、政治和军事上连为一个文化发展区域,“河陇文化”由此应运而生。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深入研究过河陇文化的发展,他在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》中说:“至于陇右即晋秦州之地,介于雍凉间者,既可受长安之文化,亦得接河西之安全,其能保存学术于荒乱之世,固无足异。故兹以陇右河西同类并论,自无可也。”

诗言志歌咏言,诗歌可以见证历史、承载历史。唐代诗人卢照邻的《陇头水》情景交融回肠荡气:“陇坂高无极,征人一望乡。关河别去水,沙塞断归肠。马系千年树,龙系九窟霜。从来共呜咽,皆是勤王。”王维的《陇西行》只有六句,却写的主题鲜明大气磅礴:“十里一走马,五里一扬鞭。都护军书至,匈奴围酒泉。关山正飞雪,烽火断无烟。”把为国戍边、千里远征的爱国主义情愫表达的淋漓尽致,也把“陇”作为甘肃代称,深深镌刻在历史的华表柱上。这些传颂百代的千古名句,就是“陇右”与“河西”连接为一个整体的有力佐证。“河陇”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宋朝,后来虽然有时候叫做甘陇,有时候叫做陇上,但是“河陇”作为代表甘肃的历史文化概念,到如今从来没有改变过。因此,把由古而今的甘肃文化体系称作“河陇文化”,是有着充分历史与文化依据的。(上)